



中国现实经济热点问题系列
ZHONGGUO XIANSHIJINGJI REDIANWENTI XILIE

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第二版

周叔莲 王延中 沈志渔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013058895

D616
355

风险社会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构建研究

崔德华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险社会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研究/崔德华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607-4798-9

- I. ①风…
- II. ①崔…
-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9826 号

策划编辑:张晓林

责任编辑:秦大忠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山东泰安金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4.75 印张 272 千字

版 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S1)	第一章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兴起	(15)
(S2)	第一节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兴起的时代背景	(15)
(S3)	第二节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发展历程	(29)
(S4)	第二章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历史探源与时代解读	(41)
(S5)	第一节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含义与特征	(41)
(S6)	第二节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研究视角	(73)
(S7)	第三节 超越风险社会的应对策略	(92)
(S8)	第三章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评析	(106)
(S9)	第一节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时代价值	(106)
(S10)	第二节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局限性探析	(114)
(S11)	第四章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严峻风险考验	(126)
(S12)	第一节 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现状	(126)
(S13)	第二节 当前我国风险现实的时代特征	(145)
(S14)	第三节 当前中国风险现实的成因探究	(153)
(S15)	第四节 中国与西方社会风险的内源性差异	(162)

第五章	防范风险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思路	(172)
第一节	西方发达国家风险治理的成功探索与缺憾	(172)
第二节	超越风险困境、实现社会和谐的路径选择	(179)
第六章	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探析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构建	(197)
第一节	风险社会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刻启示	(197)
第二节	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考察	(205)
结语		(211)
参考文献		(217)
后记		(230)

(1)	陈兴雷会长讲话稿	第一章
(2)	张晋平讲话稿	第二章
(3)	陈忠林讲话稿	第三章
(4)	黄耀先讲话稿	第四章
(5)	孙林生讲话稿	第五章
(6)	陈晓东讲话稿	第六章
(7)	陈志列讲话稿	第七章
(8)	陈志列讲话稿	第八章
(9)	陈志列讲话稿	第九章
(10)	陈志列讲话稿	第十章
(11)	陈志列讲话稿	第十一章
(12)	陈志列讲话稿	第十二章
(13)	陈志列讲话稿	第十三章
(14)	陈志列讲话稿	第十四章
(15)	陈志列讲话稿	第十五章
(16)	陈志列讲话稿	第十六章
(17)	陈志列讲话稿	第十七章
(18)	陈志列讲话稿	第十八章
(19)	陈志列讲话稿	第十九章
(20)	陈志列讲话稿	第二十章

导 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风险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常态现象,无数的风险如海洋下的冰山不断地涌现出来,纷纷从潜在形态转变为显然形态,它们已渗透到世界的角角落落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进入风险社会阶段。风险日益凸显和风险社会的到来,使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无法回避其冲击,“风险”已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全球性话题,成为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作为积极行进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的一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具有敏锐的时代意识,关注风险,研究风险社会,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实践中积极作为,便成为一个难以规避的时代选择,也成为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前途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一节 风险挑战: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新课题

“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风险是时代带给人类的挑战,也是时代对人类发出的口号。规避风险、实现和谐、促进稳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人类谋求安康和谐的社会秩序和美好生活的长远愿望。综观寰宇,我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天人合一”、“和为贵”、“天下大同”理念,西方则追求“理性秩序”、“社会团结”、“社会整合”、“冲突中的和谐”思想。^②尽管这些思想观念具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② 追求社会和谐,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追求。从学术界研究的角度看,西方许多社会学家提出了包含和谐思想的观点,孔德提出了“理性秩序”的观点,认为社会秩序的建立是和谐一致并相互关联的;迪尔凯姆提出了“社会团结”的观点,认为社会团结是指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调一致、相互结合的关系;帕森斯提出了“社会整合”的观点,强调社会系统之间的完美整合;科塞提出了“冲突中的和谐”的观点,认为冲突是社会变迁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的概念。参见陈成文、陈海平《西方社会学家眼中的“和谐社会”》,《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9期。

难以避免的视野局限，在实践上也具有难以操作的空想成分，但无一不包含了一种和谐至上的文化精神、一种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一种追求和谐有序的崇高理想和一种实现和谐稳定的最高价值理念，深刻地表现出人类对自身实践行为的深刻反思和对和谐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一、风险：人类难以规避的时代境遇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风险一直如影随形，始终向人们昭示着它们的存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与风险不断抗争的历史，人类战胜了旧的风险，新的风险仍然不断涌现，风险时时有，风险无处不在。人类在成功和化解战胜风险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行。尽管风险并不一定必然发生，但它们依然如海洋下遍布的险石暗礁，令人捉摸不定、防不胜防，一旦它们降临不仅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破坏，而且还会造成社会环境的极度恶化，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社会民众心理的焦虑恐慌，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带来严重威胁。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已成为威胁和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难以规避的时代话题，必须勇敢面对和积极对应，方可摆脱困境、走向和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自身制造和面临的风险因素日益增加。人类社会的深刻变迁迫切需要进行理论层面的创新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更好地揭示人类社会的时代特征和重要议题，并积极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出路，基于此，风险社会理论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社会学领域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席。众所周知，任何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都是与其所处时代进行对话的产物。从风险社会理论产生的背景来看，它的兴起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人类社会历史的车轮隆隆驶至全球化时代之时，风险已日益成为一个难以规避的重要话题。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声巨响，导致了严重的核泄漏，打破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盲目自信，粉碎了人们对和谐稳定的幻想。随后，经济风险、生态风险、人口爆炸、基因风险、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风险日益凸显，这些风险几乎穿透一切社会领域，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了一幅令人惶惶不安的风险图景，而且这些风险彼此交织、协同冲刺、联袂出击，呈现出极强的扩展效应和发展势头，将人类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困境之中，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风险的不断出现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和造成的严重后果，惊醒了对稳定有序、和谐发展的未来社会怀着无限憧憬的人们，人们由此日益认识到风险已成为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话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以社会学家的高度时代感和自觉

意识,敏锐地把握住人类社会的深刻变迁,并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同样在1986年,贝克在其经典著作《风险社会》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险”、“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活在现代社会就是生活在风险之中”,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①,人类社会已进入到“风险社会”阶段,开创了风险社会研究的先河,奠定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随着风险的不断涌现,紧随贝克之后,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和德国学者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基于不同视角对风险社会进行研究,从社会制度、风险文化等角度阐释风险现实,进一步扩展了风险社会的研究视域,用风险社会来描述当人类社会的深刻特征,由此构成了多姿多彩、博大精深的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尽管这些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和解读“风险”、“风险社会”,研究重点有所差异,但他们都敏锐地感知到人类社会的深刻变迁,正确地指出“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②,高瞻远瞩地预见到风险社会的来临,认为风险社会已成为人类无法规避的境遇。这些观点振聋发聩,发人深思。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尽管人类生活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风险依然是当人类难以规避的严峻现实,在当今社会中,风险的发生更加频繁、表现形式更具有多样性、波及的范围更广、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风险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主题,对风险的深刻认识和反思亦成为人类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自“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以来,随着现代社会中的一系列“风险景象”不断涌现,学术界对这一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此后,“风险社会”^③研究便成为一个跨国家、跨世纪、跨学科的热点问题。它同样也成为我国学者关注和研究的话题。风险社会理论具有巨大的理论含量和极强的分析力,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与风险决策、风险治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主要致力于风险问题的理论探讨,以期为风险决策的制定和风险治理活动的开展提供理论参照。风险社会理论研究首先涉及的基本问题是风险现实,严峻的

^①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 18.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③ “风险社会”是一个广泛有争议的话题,不少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不可因风险增多就认为当今社会处于风险社会阶段,例如,我国学者何传启就认为以风险社会来描述工业社会后的社会,具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这种提法是消极的,等等。在笔者看来,无论是风险社会倡导者的鼓与呼,还是风险社会反对者的争与鸣,当人类面临的潜在的或显在的风险因素确实在增加着,而且这些风险日益与人类的行为相关,成为“人为风险”,正是这一点发人深思,给人启迪。

风险现实和不断涌现的风险景象是风险社会理论产生的物质前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人们在享受着幸福生活的同时,也明显地感受到了风险的日益逼近和威胁。至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以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为显著标志,经济风险、生态风险、人口爆炸、基因风险、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风险日益凸显,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了一幅令人惶惶不安的风险图景,将人类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困境之中,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使人类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阶段,风险社会便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无可规避的境遇。所有这些,都激发了人们对风险现实研究的兴趣,从而形成了由表及里向纵深发展的理论梯度和研究内容的拓展。

理论是时代的心声。一个理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洞悉社会的深刻变迁,并能透彻地分析社会变迁中的规律,探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风险社会理论就是这样的理论,它是贝克等西方学者对全球化和现代性带来的不良后果进行深刻而又睿智的反思的结果。风险社会理论是在对当今社会发展现实的深刻反思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抽象和概括所形成的,它触及了当今社会最敏感、最突出、最难解决的时代性课题,它以独特而新颖的视角,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后果、弊端及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作了深刻的分析,为人们理性地看待全球性风险现实,以规避风险、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贝克、吉登斯等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学者立足于全球化的宏阔背景,以西方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研究基点,深刻洞悉到人类社会的深刻变迁所带来的风险景象,比较准确地指出了当代人类社会所处的阶段——风险社会阶段。同时,风险社会理论也较准确地描述和分析了当今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进程提供了独特而新颖的视角,为人们制定相关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性。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社会学领域中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尚未进行深入挖掘的理论范畴,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问题有极强的解释力,这一理论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风险的重要理论依据。这就意味着,研究风险、关注风险,进一步树立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观念,便理所当然地被推到至关重要的位置,成为时代赋予人们的使命。

二、双重风险:构建和谐社会的严峻挑战

当前阶段,我国正积极活跃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全球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但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球化,而且还是风险的全球化,全球化扩大了风险的递增效应,使风险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任何民族国家、组织和个人都难以摆脱风险的冲击。这就意味着,在全球化舞台

上大显身手、积极发挥作用的中国势必会受到全球性风险的深刻影响,置身于一系列全球性风险的包围之中,这是我国进行经济社会建设的宏阔背景。

从国内来看,我国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社会秩序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失衡性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经历着激烈的社会转型。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开始进入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由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过渡的急遽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而这种“社会转型是‘压缩饼干’”^①式进行的,具有强烈的时空压缩性,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以及本土与全球因素交织在一起,因而社会转型具有复合性的特点。这就容易使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矛盾集聚,风险加大,造成风险类型的多样性、风险主体的多元性和风险关系的复杂性、风险后果的严重性,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迅速分化,进入了风险的多发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与风险蜂拥而至,甚至以一种激烈的、爆发式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有:经济风险依然存在;腐败现象依然严重,干群关系紧张;社会阶层加速分化,部分社会阶层被抛离在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之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三农”问题严重;就业问题突出;社会公共治安形势严峻;道德滑坡,使我国的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个关键时期,如果采取的风险应对政策切实有效,各种风险处理得好,就能有效协调各个风险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建构起合理的风险分配和承担格局,降低各种风险的发生,消除风险的影响,比较顺利地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轨道,实现社会和谐;如果处理得不好,不但无法解决旧有的风险,新的风险更会不断涌现出来,甚至导致社会混乱,社会将陷入停滞、徘徊,甚至倒退。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何构建这样的社会便成为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前途命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风险因素的日益增加与不断扩展,对政府的风险的风险意识、风险观念治理风险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政府的思维方式和治国理政的范式带来了深刻影响,迫切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观念,勇敢地面对风险挑战,提升应对和治理风险的能力,充分发挥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主导作用,最大限度地治理和化解风险,摆脱风险困境,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要更好地研究治理和化解风险,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必须从理论和

^①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实践的视角,对风险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顺利度过社会转型期,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能否进入社会良性运行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轨道。目前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如果我们能积极采取措施,有效应对和解决所面临的风险,就能比较顺利地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社会的和谐;反之,就会遭到挫折,社会难以和谐,甚至会动荡不安。因此面对进入风险高发期的严峻现实,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何构建这样的社会便成为关乎我国发展前途的一个重要问题,成为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

为此,就需要立足于风险不断涌现的严峻现实,不断深化和拓展传统的和谐理念,实现理论上的创新,推动应对风险的实践活动。面对风险的严峻挑战,我们党和政府敏锐地认识到了风险的冲击和影响,2002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考察时告诫全党要保持“三个清醒”:必须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困难和风险;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2008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在讲话中12次提到了“风险”一词,满怀忧虑地指出:“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所肩负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规模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①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主席再次旗帜鲜明地告诫全党:“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前所未有。”^②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风险不断呈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我们党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主动顺应,是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积极选择。积极化解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把社会和谐作为小康社会的重要特征,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从而更加注重社会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2004年9月,党的十六四中全会又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位置,强

^①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200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调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对我国古代和谐思想的继承和遵循，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完善和创新。

从本质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和谐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问题和风险的社会，而是一个矛盾、问题和风险不断呈现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是在不断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治理风险的过程实现的。国内著名学者郑杭生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也即是一个在横向纵向两个方向运行有序的社会。构建这样的社会，离不开对我国各种社会矛盾真实状况及其复杂性和严峻性的正确认识和清醒分析。因为和谐社会就是在不断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增进团结的过程中达到的。”^①这就意味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的深刻分析，离不开对我国已进入到风险高发期严峻现实的透彻认识。当前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激烈的社会转型期，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加剧了矛盾、问题的出现，使我国进入了风险的高发期，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难以规避的现实背景。深入研究对人类社会发展现实有着深刻分析的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借鉴其“合理内核”，以治理和化解风险，构建和谐社会，是本书的中心议题。

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是均衡的、稳定的、公平的、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然而，和谐社会中却总是充满着矛盾、冲突、动荡、不和谐因素和风险。“社会和谐是现代性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是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焦点、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②这样，就把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突出起来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风险，规避和治理风险，超越风险社会，追求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为我国宏观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思路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风险社会理论对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风险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和透彻的分析，而当前阶段我国正面临着全球性风险和社会转型性风险的严峻考验，因此，有必要深入加大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力度，以期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

^① 郑杭生：《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7 走向更加有序的社会：快速转型期社会矛盾及其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郑杭生、李路路：《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会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第二节 研究主题、理论与现实意义分析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本书致力于探究和考察发端于西方国家的风险社会理论,力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阐释和分析由西方学者首开先河所倡导的风险社会理论,但研究的目的绝不仅仅局限于对这一理论进行无休无止的争论和一味地求全责备,而是要辩证地分析和解读这一理论,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找出与当前中国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构想的结合点,从风险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增强政府和民众的风险意识,更好地规避和治理风险,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风险社会理论虽然是在分析生态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但它更强调从制度的角度理解风险的产生和解决,更具有实践性。这种理论倾向与当代中国所面临并需解决的问题是切合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制度性风险,即因制度的不完善而造成的。

任何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回应都离不开生动的现实生活。对时代问题予以理论层次的关注和深刻反思,考察其中具体的症结,在实践层面探寻解决这一时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开展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所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多全球风险和社会转型风险的严峻现实生动地昭示着:树立起敏锐的风险意识,增强对风险的警惕性,规避风险,实现社会和谐,已经突出地成为当代中国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直接关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创新,关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创造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和谐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谐社会已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吸引力和极富时代内涵的重要命题。研究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辩证地审视全球化的契机,既为我们解决和谐与风险、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张力失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理论依据,也为我们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提高规避、化解、治理风险的能力提供了生动的现实借鉴。面对改革开放和激烈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问题,不少学者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分析,也有一些学者实事求是地从风险的角度加以审视,成为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亮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我国面临的风险现状、诱因及其出路等问题,学界的研究却还不够深入和系统。因此,为了尽快完成我国社会转型的任务,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我们不仅要有敏锐的风险意识、高度的责任心,而且还要有突出的前瞻意识、主动积极的实践行为,对我国面临的不和谐因素与风险进行积极的探

究，并积极探寻能够有效化解风险、摆脱困境、实现社会和谐的出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发轫于西方社会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为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新思路提供一种总体性的参考，这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讲，加强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可以拓展和谐社会的理论深度。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为我们反思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无疑也成为我们深刻透视急遽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风险现实的可贵指导思想。规避和化解风险、实现社会和谐不是一个浮在表层的问题，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深刻的、复杂的问题，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支撑。通过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探究和考察，通过对“风险社会”这一主题的深刻揭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地吸收和借鉴风险社会理论，突破风险社会理论的局限性，拓展风险研究的理论视野，可以深化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力度，丰富和充实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升。从现实意义上讲，深化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可以为中国更好地认识和分析所面临的风险并治理和解决这些风险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如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所说：“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①当前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全球风险和国内社会转型风险等多元风险的冲击，各种风险日益凸显，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已经突出地成为当代中国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和分析源风险社会理论，对我们增强风险意识、培养风险观念、理性地反思和控制自身实践行为、减少消极影响、避免带来更多负面效应和消极后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全球范围的风险和中国社会加速转型带来的特殊风险，使我们面临着双重的或叠加的风险考验，迫切需要我们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正确认知所面临的风险考验，加强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造成诸多风险的经验教训，提高对风险的警觉性，自觉治理和应对风险，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的冲击，确保生产力发展与改革成果人民共享、经济社会良性运行的和谐局面，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如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大卫·雷·格里芬所说：“中国可以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

^①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①由于看到当今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同时，也蕴藏着无数的不确定因素与风险，我国学者开始关注西方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全球性风险的影响和冲击，对于中国来说绝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更不是毫不关己、高高挂起之事，而是现实的、严峻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多风险的日益凸显，带来的灾难之重、造成的影响之深，终于使人们警醒：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风险，我们应当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克服盲目的行动和不理智行为，减少风险因素的酝酿和积累，促进和谐因素的增长，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有序的氛围，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质和优越性的根本体现，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

本书在对源自西方社会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系统梳理、辩证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将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对当前阶段我国面临的风险现状进行阐述和探讨，进而结合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中风险的特殊性，为我国成功地度过社会转型期、有效地应对和解决风险、超越风险困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寻找可行的出路，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这正是本书研究的意义所在。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及研究意旨

风险社会理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社会理论。随着全球化潮流的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在这一过程中，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风险事件不断涌现，甚至是联袂冲击，使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风险情景引起了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他们从风险的视角透视人类社会的深刻变迁，不仅积极地进行理论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从而把风险话题和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推向学术前沿，而且在实践中主动出击——积极探寻规避和解决风险社会困境，实现社会和谐的出路。其新颖的研究视角、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切中要害的现实针对性，以及对风险社会总体风貌的开创性论述，使得风险社会理论成为反思现代性思想的重要理论，从此，“风险语义正逐渐盖过经济语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②。自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以来，随着现代社会中的一系列“风险景象”不断涌

^① 王治河：《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代序），[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 页。

^② 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 年第 3 期。

现,人们对这一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从此“风险社会”^①研究便成为一个跨国家、跨世纪、跨学科的热点问题,它同样也成为中国关注和研究的话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风险社会理论便因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备受人们关注,很快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很快风险社会研究便成为跨国家、跨世纪、跨学科的热点问题。

与西方学者对风险社会如火如荼的研究现状相比,国内学者对风险社会研究开展得比较晚,尚处于起步阶段。但 2003 年 SARS 的肆虐,催生了我们的风险意识,使越来越多的学者真切地感受到风险的威胁,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并认识到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能只流连于学科概念及范畴之争,而必须回应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重大现实问题,以期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开出有效的“济世良方”,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国内学者们率先翻译和整理了对风险社会研究颇有建树的西方学者,如贝克、吉登斯、拉什等人的著作或文章,比较全面地涉猎了西方学者的风险社会理论。近年来我国学者翻译和出版了一批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的风险社会理论的著作,主要有贝克的《风险社会》、《世界风险社会》等以及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界》等。他们试图把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已成为我国理论界的又一重要研究领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其代表作薛晓源、周战超的《全球化与风险社会》^②、杨雪冬等人的《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③、刘挺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风险》^④、潘斌的《社会风险论》^⑤、刘岩的《风险社会理论新探》^⑥、庄友刚的《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⑦等,让我们进一步领略了这些学者多姿多彩的理论视野。在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思想、新观点,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学者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当前我国理论界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有的研究成果与现实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具体表现为:(1)从研究内容上

^① “风险社会”是一个有广泛争议的话题,不少学者质疑是否因风险的增多,不认为当今社会处于风险社会阶段,例如,我国学者何传启就认为以风险社会来描述工业社会后的社会,具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这种提法是消极的,等等。在笔者看来,无论是风险社会倡导者的鼓与呼,还是风险社会反对者的争与鸣,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当今人类面临的潜在的或显在的风险因素都在增加着,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风险日益与人类的行为相关,人为风险愈来愈多,后果愈来愈严重,是值得深思的。

^② 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④ 刘挺:《经济全球化与社会风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⑤ 潘斌:《社会风险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⑥ 刘岩:《风险社会理论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⑦ 庄友刚:《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看,国内学者更多的是翻译和介绍西方学者的风险社会理论和其基本观点,但缺乏把这种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结合。尽管一些学者在解读这些理论时试图从风险社会的视角来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但仍缺乏理论层面的厚度和现实层面的宏观思考。(2)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国内学者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未能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地分析西方学者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局限性,亟待进行深入研究。(3)从研究成果上来看,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与西方学者的著作和论文数量相比,虽然数量众多,但对政府决策和民众风险意识等方面产生的社会影响力相对较弱,而且处于较分散的状态,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不少研究成果往往从单一的角度来论述和谐社会的构建,未能将和谐社会的构建置于风险社会的视角下进行研究。因此,迫切需要拓展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需要我们立足于当前中国面临的风险现实,深化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从这种理论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以规避和化解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提高政府应对和解决风险的能力,加快推进和谐社会的进程。尽管这样的研究难度很大,但仍然有很大的发掘空间,是一个能够有所创新、大有作为的研究领域。基于此,本书选择以风险社会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研究为内容,以期在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增进和提高,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风险,但绝不止于对风险进行一般的、抽象的研究,而是立足于当今人类社会深刻变迁的时代背景探讨人类面临的风险景象,进行理论层次的思考与提升,并从实践角度探讨解决风险困境、超越风险社会的出路。

本书的研究思路遵循了以下几方面的轨迹: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对风险的概念进行追根溯源,厘清风险的时代内涵,接下来在占有较为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西方学者倡导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较为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试图提供一幅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较为完整清晰的理论画卷,以深化前人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内容。通过对源自西方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力求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以科学的、严谨的态度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解析,充分借鉴这一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得出深刻的启示和有价值的借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的一些基本精神和时代价值,的确超越了国别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这一理论所包含的强烈的风险意识、深刻的反思性、敏锐的现实性、对风险社会出路探寻的积极性,都是极富开创性的,它对当前风险图景的思